

上海大学出版社

泮池集

泮梁题



——首届中国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上海市本级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主 编 邵炳军

副主编 姚 蓉 杨秀礼

主 编 邵炳军
副主编 姚 蓉 杨秀礼

泮池集

泮梁题



——首届中国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上海市本级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上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泮池集：首届中国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邵炳军, 姚蓉, 杨秀礼主编.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7-5671-0440-2

I. ① 泮… II. ① 邵… ② 姚… ③ 杨… III. ① 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学术会议—文集 ② 地方文化—中国—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 I206.2-53 ② G12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5345 号

责任编辑: 陈 强

封面设计: 施羲雯

技术编辑: 金 鑫

章 斐

泮 池 集

首届中国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邵炳军 主编

姚 蓉 杨秀礼 副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021-66135112)

出版人: 郭纯生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江苏南洋印务集团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31.75 字数 536 000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71-0440-2/I·178 定价: 88 元

序

邵炳军

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必须坚持从经验实证到理性思辨的方法论原则,恪守“左图右史”的治学理念,用年代学(Chronology)与地理学(Geography)“两只眼睛”看文学,关注时间与空间两大要素,使“图”与“史”互相参补印证,力求客观地反映文学发展历程,探索文学演变规律。所谓“图”,就是运用地理学理论与方法,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描绘文学作品“方輿图谱”,为建构文学地理学(Geography of Literature)奠定基础;所谓“史”,就是运用年代学理论与方法,考订文学作品创作时间,排定文学作品“年代谱系”,为建构文学年代学(Chronology of Literature)奠定基础。

遗憾的是,我们在已往的研究过程中,关注“史”者较多,而关注“图”者甚少。我们知道,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精神产品,故对时间的强调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历史同时又是在特定的地理空间中展开的,地理空间是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演出的舞台,有了地理空间,人物与事件就能立体地凸显出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乃至整个文学研究如果只考虑时间元素(时代性)而忽略空间元素(地域性),许多问题便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

事实上,从地域文化生态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的地域性特征,是一个非常古老但又新兴的话题。说其古老是因为春秋后期吴公子札聘鲁观乐时已有所论及;称其新兴,则是因为直到近二十年来才有学者开始对此有所关注。就笔者自己而言,从2002年起开始指导由十四位硕士生、博士生与博士后组成的学术团队,陆续进行“先秦诗歌地域性与华夏文化演进研究”;近年来,又带领由文学、史学、哲学、艺术学等不同学科门类的二十七位教授、副教授及在站博士后、在读博士生开展“长三角区域文化研究”。当然,笔者在上述学术研究实践之中,既不乏成功的喜悦,更遇到一些理论层面的困惑与操作层面的难度。正

鉴于此,笔者倡导召开了“首届中国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学术研讨会”暨“首届中国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博士生暨博士后论坛”,并取得了圆满成功。在会议论文集即将结集出版之际,笔者将自己十年来研究中国文学与地域文化过程中思考的若干问题陈述于后,作为会议论文集之序,以求教于方家。

1. 地域文化生态是文学地域性特征形成的要素之一

地域作为地理学的一个空间单位,其所指实际上是相当随意和模糊的。它可以是一个很小的地区,也可以是一个很大的范围;但地域一般与特定的地貌及由此形成的自然地理分野有关,在自然分野基础上形成的地理区划,又强化和充实了地域的概念。我们所谓的地域,不仅仅是一个地理范畴,更是指在特定的地理空间内的自然环境、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历史等诸多因素,亦即地域文化生态。因为地域是个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概念,它除了具备空间上相对明确而稳定的形态之外,还具备了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传统等精神形态。自然地理环境是其最表层的东西,而风俗习惯、性情禀性、社会制度是其更深层的东西,其核心层面则是气质、心理、价值观念等。它们都从不同的层面对文学创作产生重要的影响。法国哲学家丹纳的《艺术哲学》认为:

人与文学是种族、环境和时代三因素的综合产物。^①

他将环境与种族、时代并列作为文学创作的三要素之一。傅璇琮在《〈唐代诗人丛考〉余论》中指出:

从丹纳的书我得到很大启发,我觉得研究文学应当从文学艺术的整体出发,这所谓整体,包括文学作为独立的实体的存在,还应包括不同流派、不同地区互相排斥而又互相渗透的作家群,以及作家所受社会生活和时代思潮的影响。这牵涉到总的研究观念的改变。^②

事实上,《吕氏春秋·音初篇》、《管子·水地篇》、《大戴礼记·千乘篇》、《汉书·地理志下》、《文心雕龙·物色篇》等我国古代论著早已开始关注环境与文学创作的关系问题。《吕氏春秋·音初篇》曰:

① [法] 丹纳《艺术哲学》中译本,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34 页。

② 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余论》,《唐诗论丛稿》,京华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0 页。

孔甲曰：“呜呼，有疾命矣夫！”乃作为《破斧》之歌，实始为东音。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侯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殷整甲徙宅西河，犹思故处，实始作为西音，长公继是音以处西山，秦缪公取风焉，实始作为秦音。……有城氏有二佚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①

此言因地域方位不同自然就有“东音”、“南音”、“西音”、“北音”等音乐歌谣之异，而这些起源于不同地域的音乐歌谣在其所产生的地域上一直在传承着。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云：“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然则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此言山林皋壤等自然环境与文学创作的关系问题。

环境何以对文学创作产生影响呢？先秦两汉时期的人们已经开始关注并从理论上进行了探讨。《管子·水地篇》云：

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②

西汉戴德《大戴礼记·千乘篇》云：

是故立民之居，必于中国之休地，因寒暑之和，六畜育焉，五谷宜焉；辨轻重，制刚柔，和五味，以节食时事。……及中国之民，曰五方之民，有安民和味，咸有实用利器，知通之，信令之。^③

此皆言一方水土造就一方人的气质、精神和品格，亦即不同的地域环境及地域文化生态孕育出人的不同品质、气质及相貌。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下》：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

① 旧题[周]吕不韦撰、[汉]高诱注《吕氏春秋》，上海书店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云间宋邦义刻本，1985年版。

② 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梁运华整理，2004年版，第813页。

③ [清]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点校十三经清人注疏本，王文锦点校，1983年版，第162页。

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①

此言由于地域环境不同而民俗民风相异，亦即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出不同的人文环境。今人的论述则更加深入。王水照《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指出：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赖于地理环境所提供的空间，地理环境对于该地区人们的生产方式、行为方式和精神状态、性格好尚等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在人们的文化创造和文学活动中，环境的作用更为显著。^②

他特别强调指出：

环境对于学术文化、文学创作的影响，乃是不争的事实。而在构成环境的、人文的、自然的或两种交融的诸要素中，区域的人文性文化对文学活动的影响是最直接、最显著的。^③

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也指出：

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是通过区域文化这个中间环节而起作用。^④

的确，地域是存在于人类社会之外的地理环境，不仅仅包括自然环境、自然资源及自然风光，也包含着文化遗存。这些不同区域内的文化遗存，正是该区域内历史文化沉淀的必然产物。它有力地制约着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它可以在无形中对人类的思维、情感、审美产生影响，从而构成文学产生、发展及风格形成的外部因素。就自然环境论之，自然环境的差异必然会引起人文环境的差异，其通过对人的影响而影响文学作品

①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校点颜注本，傅东华等点校，1962年版，第1640页。

② 王水照《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文学遗产》，1994年第3期，第74页。

③ 转引自景遐东《江南文化与唐代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

④ 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理论与创作》，1995年第1期，第9页。

的品格。自然环境对人们的精神气质的影响,在人类早期的生活中更为重要。在人类早期,人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制约着物质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并由此形成彼此不同的风俗习惯和传统,从而对人们的精神气质、文化心态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远古时代的交通不发达,使人们的生活区域常常为山水所阻隔,彼此缺乏信息沟通,于是在各自的地域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区域。可见,环境之所以对文学创作产生影响,是因为地域环境不仅包括自然环境,也包含着不同区域内历史文化的遗留和沉淀。这种客观上的自然环境差异的存在,形成了主观上深层的文化心理、思维模式、价值观念、情感取向、审美情趣等精神层面上的地域性差异。它们互为关联、相辅相成,共同影响着作家的生活和文学作品的创作,从而构成不同地域文学的产生、发展及地域性特征形成的外部因素。^①

英国的彼得·伯克在《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中认为:

社会成员自己经常使用空间比喻,例如在谈话中说到社会“阶梯”、“金字塔”,抑或“上流”或“下层”阶级,或者把个体或群体描述为“仰视”或“俯视”别人。社会理论家也同样如此。“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基础,上层建筑),这些比喻就是从地质学和建筑学借来的。^②

可见,尽管“空间”与“时间”是两个不同纬度的范畴,但又是两个彼此依存的范畴,没有“空间”的“时间”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所以,离开了“空间”范畴,恐怕我们连日常表述都成问题,自然谈不上全方位、多纬度地开展学术研究了。这正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地域性特征的客观依据与理论起点。

2. 地域文化生态对文学作品地域性特征形成的影响

众所周知,在中国谈论地域文化生态的差异性,溯其源当在先秦时期。《国语·晋语四》载晋惠公十四年(前 637 年)晋司空季子(胥臣)^③谓公子重

① 李伯齐《地域文化生态与文学小议》,《聊城大学学报》,2002 年第 6 期,第 68—72 页。

② [英]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中译本,姚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1 页。

③ 胥臣(?—前 622 年),即僖公二十三年《左传》、《晋语四》、《晋世家》之“司空季子”,亦即僖公三十三年、文公五年《左传》、《晋语四》、《晋语五》之“臼季”,姓姬,氏胥,其后别为司空氏,名臣,字季,尊称子,晋公族,食邑于臼,晋文公五年(前 632 年)为下军佐,后官至司空,位在卿列。其素有贤名,熟知卜筮,精通《周易》,谙习《诗》、《书》,善于辞令,富有文才,为春秋中期晋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与文士。说详:邵炳军《胥氏、解氏、张氏族属、世系暨作家群体事略考——春秋时期晋国世族作家群体与文学创作研究之五》,待刊。

耳曰：

昔少典娶于有蟠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①

可见，春秋中期卿大夫已经认识到从传说中的“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时开始便有了地域文化生态的差异性问题。夏、商时期的文化状况，已由丰富的地下考古发现证明存在着巨大的地域差别。周初大肆分封诸侯，经数百年的发展，在文化的共同因素不断增加的同时，文化的地域性差异仍非常突出。^②两周时期，随着宗族城市（城邦）国家的发展与领土国家的形成，族权与政权合一的血缘国家结构形态的形成与完善，以田野制为基本形式的社会结构特征的发展与以地缘为基础的什伍乡里制度的确立，以井田制为主要形式的宗族土地所有制发展与土地私有制的出现，以贵族与君主共政为主要特征的贵族宗君制发展与诸侯国及宗族兼并的出现，这就构成了两周时期独特的社会政治结构。^③这种独特的社会政治结构，自然使两周乃至整个先秦时期的文化形态成为各种地域性文化的综合体。^④同时，西周虽然建立了一个相对统一的邦国，但周王室直接治理的王畿之域仅仅是位于渭河流域的关中平原，那些通过分封制度建立的诸侯国家的方土风气、方言土语、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缘此环境熏习而成长之人物皆有其独特性，并不会因为周王室的政治统治而丧失其地域特征。这是因为姬周文化虽然成为居于统治地位的文化，但它依然不是广被一切地区的文化。事实上，即便是像汉唐时期相对统一而强大的帝国，统治者所倡导的儒、释、道文化也始终没有成为广被一切地区的文化。^⑤作为古代文化载体的文学，也自然会体现出丰富的地域性特色。

文学作品作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特质的载体，必然要受到文化的地域性特质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的直接表现就是文学作品的地域文化生态特色和地域性特征。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描写对象，包括特殊地域的环境、人物、风俗、语言、文化传统等；一是来自作家本身，作家的地域文化心理特

① [三国吴]韦昭注《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黄丕烈刻士礼居仿宋刻明道本，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1998年版，第356页。

② 钱中文《文学发展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8—359页。

③ 邵炳军《周大夫家父〈节南山〉创作时世考论》，《文献》，1999年第2期，第23—41，169页。

④ 李旦初《〈国风〉的地域性流派》，《山西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第22—28页。

⑤ 谭其骧《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与地区差异》，《复旦学报》，1986年第2期，第7页。

质和地域文化知识以及对地域文化传统特色的敏锐感受力,则成为文学作品的地域文化特色形成的关键所在。特定的地域有特定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特定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产生的精神产品即文学作品。地域性特征研究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从地域的角度来讨论文学,将文史结合、文学与地域结合、文学与文化结合,将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特定的文学作品与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特定的地域性结合,归结为研究文学作品的地域性特征。^①

同时,先秦两汉时期人民也开始关注并在理论上探讨诗乐对地域文化生态的影响。《礼记·王制》:

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②

《汉书·地理志下》: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庠中和,^③然后王教成也。^④

《汉书·艺文志》:

《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⑤

正是由于一个区域内产生的艺术作品,也会反过来影响这个区域甚至更大的

① 何西来《文学鉴赏中的地域文化生态因素》,《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第50—56页。

② [唐]孔颖达《礼记正义》,中华书局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版,第1328页。

③ “一”,文渊阁刻本作“壹”。

④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校点颜注本,傅东华等点校,1962年版,第1640页。

⑤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校点颜注本,傅东华等点校,1962年版,第1708页。

区域的政治行为及文化生态,故先秦时期的执政者采集民间歌谣或者文人创作的诗歌,来考订政治得失。这种行为必然会影响政府行政策略和文化制度,从而对一定区域的文化产生反作用。因此,文学作品地域性特征的发生、发展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整合的文化生态,也就是说作家的心态与地域、经济、政治、教育等四大文化生态要素形成了整合性互动关系,而并非是单一的纯文学的个人行为。故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指出:

苟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之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①

金克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则进一步强调指出:

我觉得我们的文艺研究习惯于历史的线性探索,作家作品点的研究;讲背景也是着重点和线的衬托面;长于编年表而不重视画地图,排等高线,标走向、流向等交互关系。是不是可以扩展一下,作为面为主的研究,立体研究,以至于时空合一内外兼顾的多“维”研究呢?假如可以,不妨首先扩大到地域方面,姑且说是地域学(Tonology)研究。^②

地域文化生态对文学作品地域性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文学作品的地域性特征对地域文化生态的形成又具有反作用。这也正是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地域性特征的客观依据与理论起点。

3. 地域文化板块与文学创作的地域性流派

文化区是指文化特质综合体的空间单位。文化区的划定,通常采用文化要素叠置法,即先将文化系统中具有代表性及因果关系的重要文化特质选择出来,研究其区域分布状况,文化特质大致重合之处,可视为一个文化区域。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内,学术、宗教、艺术、民俗等总是表现出共同的区域特征,形成文化的区域综合体——文化区域^③。从文化地理学角度看,文化区域具有形式、功能、感觉三种不同的性质^④。文化区域又分为核心区与边缘区。所谓

①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9页。

② 金克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读书》,1996年第4期,第85页。

③ 卢云《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8、486页。

④ 张伟然《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区域及地理意象》,《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8页。

文化核心区,又被称为文化发达区域,指某一区域内文化稳定发展、长时期繁荣兴盛的地区,它往往是本区域内文化的集中代表,最能体现本区域的基本文化特点。与此相对的则为文化边缘区。当然,文化核心区并非固定不变的,当文化繁荣时期,核心区就扩张,向外辐射;当文化衰微时期,核心区就向内收缩,呈内敛之态。

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认为:

南音之始,起于淮、汉之间;北声之始,起于河、渭之间。故神州语言,虽随境而区,而考厥指归,皆析分南北为二种。……声音既殊,故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①

这篇从宏观方面探讨地域文化生态与文学研究关系的名作,揭示出一个深刻的学术理念:由于音声、山川的不同而导致了南北民俗与南北文学差异性特质。章培恒《从〈诗经〉、〈楚辞〉看我国古代文学中的地区差别》^②、陶礼天《北“风”与南“骚”》则专门申述论证刘氏之说^③。这就是今天为人们所熟知的所谓南北两大文化板块说。事实上,据《尚书》、《逸周书》、《国语》、《左传》,西周初期周人已经具有“西土”、“东土”、“南土”、“北土”和“中土”等“五土”这一地域文化生态板块观念了。与“五土”相关的地域文化生态板块概念则是“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中”所谓“五方”,亦称之为“五邦”。

昭公九年《左传》载周景王《让晋率戎伐颍书》曰:

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④;及武王克商,蒲姑、商

① 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王元化主编《刘师培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161页。

② 章培恒《从〈诗经〉、〈楚辞〉看我国古代文学中的地区差别》,《中国文化》,1989年第1期,第60—65页。

③ 陶礼天《北“风”与南“骚”》,华文出版社1997年版。

④ 昭公九年《左传》杜《注》:“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国,为西土之长。骀,在始平武功县所治釐城;岐,在扶风美阳县西北。”[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中华书局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版,第2056页。案:魏,当今山西省芮城县至万荣县之间。骀,即郃,在今陕西省武功市西南。芮,在今山西省芮城县西二十里。岐,在今陕西省岐山县。毕,在今陕西省咸阳市北。

奄,吾东土也^①;巴、濮、楚、邓,吾南土也^②;肃慎、燕、亳,吾北土也^③。

则周景王十二年(前533年)时,以今山西、陕西及西北地区为其“西土”,以今山东之地为其“东土”,以今河南南部、湖北、重庆及西南地区为其“南土”,以今北京及东北地区为其“北土”^④。可见,在春秋中期周人已经有“四土”这一地域观念了。

《国语·郑语》载周幽王八年(前774年)王室太史史伯谓王室司徒郑桓公曰:

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⑤;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⑥;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⑦;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邾、莒^⑧;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⑨。

① 昭公九年《左传》杜《注》:“乐安博昌县北有蒲姑城。”案:蒲姑,亦作薄姑,在今山东省博兴县东南十五里。商奄,即《墨子·耕柱篇》之“商盖”,在今山东省曲阜市东。

② 巴,疑即巴人之巴,或在今重庆市。濮,即文公十六年《左传》之“百濮”,在今湖北省石首县一带。楚,即楚都,在今湖北省江陵市。邓,即今河南省邓州市。

③ 昭公九年《左传》杜《注》:“肃慎,北夷,在玄菟北三千余里。”案:肃慎,亦称“息慎”、“稷慎”,为族系之名,两汉三国时之“挹娄”,南北朝时之“勿吉”,隋唐时之“靺鞨”,宋元明时称“女真”,皆其后裔,今满族先祖。其故地,或以为在今黑龙江宁安县以北,或以为即今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县西),傅斯年等《东北史纲》认为在今辽河流域,薛虹《西团山文化》(《吉林师大学报》1980年第2期)认为在松花江上游牡丹江流域一带,张博泉等《东北历代疆域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认为在今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其故地虽不能确指,足见其分布地域之广。燕,即北燕,都邑在今北京市。当时以“亳”为地名者甚多,盖殷商都亳,而都城屡徙,亳名不变。如今河南省商丘市东南之南亳,偃师县之西亳,商丘市北之北亳,然皆不足以谓为“北土”之亳。

④ 《史记·五帝本纪》:“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裴骃《集解》引徐广《史记音义》:“一无‘土’字。以为西者,今天水之西县也。”又引郑玄《注》:“西者,陇西之西,今人谓之兑山。”又引孔安国《注》:“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也。”张守节《正义》:“和仲,主西方之官,若《周礼》秋官卿也。”则此狭义之“西土”,而昭公九年《左传》中“西土”为广义之“西土”。笔者讨论《商》、《秦》、《魏》、《唐》诸风地域性特征时所谓“西土”即取其广义。又,《国语·郑语》:“桓公为司徒,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韦《注》:“周众,西周之民。东土,陕以东也。”则“东土”亦有广狭之别:狭义指成周王畿之地,广义指陕以东。又,昭公九年《左传》中“东土”指齐鲁之地,《史记》、《汉书》中“东土”多指故齐鲁之地。笔者讨论《齐风》、《曹风》地域性特征时所谓“东土”即取此意。

⑤ 《国语·郑语》韦《注》:“成周,雒邑。荆蛮,半姓之蛮,鬻熊之后。申、吕,姜姓也。应、蔡、随、唐,皆姬姓也。应,武王子所封。邓,曼姓也。陈,妫姓也。”

⑥ 《国语·郑语》韦《注》:“卫,康叔之封;燕,邵公之封:皆姬姓也。狄,北狄也。鲜虞,姬姓在狄者也。潞、洛、泉、徐、蒲,皆赤狄,隗姓也。”

⑦ 《国语·郑语》韦《注》:“八国,姬姓也。虞,虞仲之后。虢,虢叔之后,西虢也。”

⑧ 《国语·郑语》韦《注》:“齐,姜姓。鲁、曹、滕,皆姬姓。宋,子姓。薛,任姓。邾,曹姓。莒,己姓,东夷之国也。”

⑨ [三国吴]韦昭注《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清嘉庆二十三年黄丕烈刻士礼居仿宋刻明道本,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1988年版,第507页。

此说虽然仅有“南”、“北”、“西”、“东”四方位之名,而后无“土”字,然从其所举之国考之,则实与春秋时期周景王所谓“四土”说相合。故“四土”这一地域观念至迟在西周晚期已经形成。

《逸周书·作洛解》:

(周公)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①。城方千七百二十丈,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邾山,以为天下之大凑。制郊甸方六百里,国西土为方千里。^②

则成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周王畿之地即其“中土”。

据此,前所谓“四土”者,实即“西土”、“东土”、“南土”、“北土”、“中土”所谓“五土”。与“五土”相关的地域概念则是《尔雅·释地》中“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中”所谓“五方”:

东方之美者,有医无闾之珣玞琪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中有岱岳,与其五谷鱼盐生焉。^③

《诗·大雅·崧高》:“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登是南邦,世执其功。……我图尔居,莫如南土。……往近王舅,南土是保。”则与“南土”相对者为“南国”、“南邦”。《诗·大雅·韩奕》:“奄受北国,因以其伯。”此“北国”即“北土”、“北邦”。故“五土”、“五方”亦可称之为“五邦”。又,《尚书·周书·康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齔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

① 《艺文类聚》卷六十三引《周书》亦作“土中”,《水经·洛水注》引《周书》则作“中土”。《作洛解》孔晁《注》:“(土中)王城也。于天下土为中。……西土,岐周通于圻内。”按照“中野”、“中道”、“中夜”等构词规则,且又与“西土”相对,则当作“中土”为是。又,“中土”有时与“中国”同意,如《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中国,以为民逯。……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惠此中国,俾民忧泄。……惠此中国,国无有残。”毛《序》:“《民劳》,召穆公刺厉王也。”此“中国”与“四方”对举,“京师”与“四国”并言,则“中国”即“中土”。“中土”与“中国”意义又有不尽相同者,若“中国”与“四夷”、“蛮夷”、“戎”相对,则指华夏之地,如庄公三十一年《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左传》、成公七年《左传》、昭公九年《左传》等。

② 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25—529页。

③ [宋]邢昺《尔雅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版,第2615页。

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叙，乃寡兄勛，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①《大诰》、《酒诰》、《康王之诰》、《牧誓》等亦见“西土”一词，《洛诰》亦见“东土”一词。可见，周人在西周初期已经具有“五土”、“五方”、“五邦”这一地域文化生态板块概念了。

这种以地域方位为标准所划分的所谓“五土”、“五方”、“五邦”等地域文化生态板块概念，若溯其渊源，则与所谓大禹为了“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尚书·夏书·禹贡·序》）而将夏土“画为九州”^②（襄公四年《左传》）密切相关。《尚书·夏书·禹贡》简要记录了各州的名山大川及田土物产，虽未涉及各州各地不同的人文风情，但却为后来从地域角度探讨各地人文、经济开辟了道路。

《尔雅·释地》：

两河间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鹑州，汉南曰荊州，江南曰扬州，济河间曰兖州，济东曰徐州，燕曰幽州，齐曰营州。^③

则所谓“西土”、“东土”、“南土”，正为《禹贡》“冀州”、“豫州”、“鹑州”、“荊州”、“兖州”、“徐州”、“营州”之地。

周人不仅具有以地域方位为标准所划分的所谓“五土”、“五方”、“五邦”等地域文化生态板块概念，同时，已经注意到了“五土”、“五方”、“五邦”自然地域之内的文化板块相异。

《礼记·王制》：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④

此所谓“五方之民”的“不可推移”之“性”，就是其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特质。

《孟子·滕文公上》：

① [唐]孔颖达《尚书正义》，中华书局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版，第203页。

② 此“九州”之“州”依然为地域概念，而非后世行政建置意义上的“州县”之“州”。

③ [宋]邢昺《尔雅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版，第2614页。

④ [唐]孔颖达《礼记正义》，中华书局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版，第1338页。

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之。^①

此言“五方之民”的精神文化特质之“不可推移”性。

周代各诸侯国分布在辽阔的土地上，有着不同的自然环境、地域氛围和历史沿袭。同时，由于古代交通不发达，人们的生活地域为山水所阻隔，彼此信息沟通较少，逐渐在各自的地域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区域。在此地域产生的语言、文学、风俗民情也会有或大或小的差异。这些不同的社会风情和人文景观都会影响当地民众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正是这些地域文化生态板块具有“不可推移”的精神文化特质，有意无意地用来指导作家的文学创作，从而孕育出色彩各异的文学作品，孕育出文学创作的地域性风格流派。

故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提出创建“中国历史文学地理学科”的构想，他认为：

中国历史文学地理，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文学因子之空间组合与地域分异规律，可以视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同时，中国历史文学地理以其研究对象为文学，所以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按照这样的定义，中国历史文学地理有着广泛而复杂的研究内容：诸如文学发达程度的地区差异（以文学家与文学作品的多寡为主要指标），各类文体的区域异同及受地理环境影响的深浅，文学题材与风格的地域特色，个别地区文学的地理背景，地理环境对文人灵感的培育与文人创作的影响，形成文学地域差异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与人文地理环境等等，都属于中国历史文学地理的基本内涵。^②

从方法论角度来说，文学的地域性特征与文化生态的地域性研究主要运用文化地理学之人地关系理论；而区域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则直接来源于法国年鉴学派的所谓“空间史学”。美国学者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将中国经

① [宋]孙奭《孟子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版，第2706页。

② 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页。

济文化区分为“核心—边缘结构”，认为不仅大的区域经济具有“核心—边缘结构”，它的每个层次上的区域均呈现和大区域“核心—边缘结构”相类似的内部差别。^① 日本的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进一步提出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地域差异问题，并逐一分析了造成差异的各种原因。^② 这也是我们研究《诗》“国风”地域性特征的客观依据、理论起点与方法论原则。

总之，人地关系是人类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基本关系，文人的空间聚合与分离给文化带来刺激，给文学发展带来生机。^③ 也正是因为近年来学者开始关注文学的人地关系问题，中国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如断代文学地域性特征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有卢云《汉晋文化地理》（1991）、王子今《秦汉地域文化研究》（1998）^④、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2001）、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2002）^⑤、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2006）^⑥、刘跃进《秦汉文学地理及文人流布》（2012）^⑦等。从宏观理论方面探讨文学地域性特征的代表作有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1995）^⑧、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2006）^⑨、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2012）^⑩等。正在进行的断代文学地域性特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有王祥主持的“宋代地域文学研究”（2006）、崔志远主持的“地缘文化诗学与新时期地域作家群”（2007）、崔向东主持的“汉代豪族地域性研究”（2007）、何新所主持的“宋代都市文学生态研究”（2008）、左鹏主持的“文人流动视野中的唐诗地理学研究”（2010）、葛景春主持的“地域文化视域下的杜甫研究”（2010）、王培军主持的“近代诗的流派与地域研究”（2010）、余连祥主持的“地域文化视阈中的现代江南小城镇文学研究”（2010）、汪文学主持的“边省地域对文学生产和传播的影响研究——以黔中明清文学为例”（2010）、刘方主持的“宋代两京都市文化与文学”（2011）、郭万金主持的“明诗文学生态研究”（2011）、吴正岚主

① [美] 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译本，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3 页。

② [日] 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中译本，方健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③ 戴伟华《唐代文学研究中的文人空间排序及其意义》，《扬州大学学报》，1999 年第 1 期，第 15—22 页。

④ 王子今《秦汉地域文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⑤ 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增订本，中华书局 2008 年版。

⑥ 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中华书局 2006 年版。

⑦ 刘跃进《秦汉文学地理及文人流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⑧ 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⑨ 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⑩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